

第一章 国际战争与 和平理论概述

国际安全的理论阐述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释，即旨在从理论角度进行说明：什么因素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战争与暴力冲突？什么因素或者什么途径可能促进国家间的和平？

传统上，国际安全就被看做是国际关系中的“高级政治”，从而成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但是，限于篇幅和作者对有关理论的了解程度，本章不可能涉及每一个相关的理论观点（比如文化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①）。鉴于现实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本书也不打算涉及建构主义的理论。^② 另外，本书也不涉及关于如何利用军事力量以实现政治目标的理论，比如威慑理论和核战略理论。另一方面，这里的理论阐述也不会穷尽所有可能影响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因素，比如说历史遗留下来的国家间领土争端，或者可能诱导外

① 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Peter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相关的评论可见：Michael C.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Summer 1998.

② 关于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的一个评述，参见：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Summer 1998.

来干涉的一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动荡，甚至一国政治或军事领导人的惊人的军事天才。这样的因素和国际冲突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总之，本章所希望的就是对于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阐述，从而能够使人了解，在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可以有哪些基本的理论思考。

对国际战争的原因和国际和平途径的分别阐述构成了本书第一章的主要部分。其实，这种划分只是出于对本章体例的考虑。显然，如文中所表明的，对国际战争原因的分析包含着对通往国际和平之路的揭示，而对促进国际和平的某种方式的评判则常常意味着探讨什么可能是滋生冲突的土壤。以此为基础，本章的最后将试图论述理论认识和当前的亚太安全实践的关系。

第一节 关于国际战争起因的理论

冲突或战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延续至今。也许，人性之“恶”或群体的贪欲可以被简单地认定是战争的根源。可是，在这些根源一直存在的情形下，战争并未构成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和平时期依然存在。相应地，必然有更多的因素促进或抑制着战争的发生。

本节的目的是从理论角度来论述一些可能导致国家间的暴力冲突的因素。如果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而要给这些因素进行大致的分类，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流派（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而加以区分不是合适的方法。就本节所探讨的因素而言，很难圆满地将它们分别归纳于这些范畴之内。比如，如何将“民族主义”归类？“进攻与防御之间的效用关系”又应放在怎样的理论名目下？实际上，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涵盖的基本上都是体系意义上的或宏观的“大理论”，它们并不能够统领关于国际关系的所有理论认识。

另外，对若干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的论述可能要涉及非国际关系学科的有关观点。比如，在论及人性时，除了言及政治哲学家们的看法，本书也提及了弗洛伊德和洛伦兹的结论，而这些并不从属于国际关系或政治学理论的范畴。

不过，下文中的各个因素可以被归纳为不同的层次。层次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见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肯尼思·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认为国际战争的动因分布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这三个垂直的层次之中，分析了人性、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的作用。^① 布鲁斯·拉塞特所著的出色的教科书《世界政治》也运用了层次分析。他列出了从个人延伸至国际体系的更多的层次，解释了不同层次的因素如何决定着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基本面貌。^② 同样，这里所要论述的影响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诸多因素也可被认为属于几个不同的简明的层次：“人性”是个人层次上的，关于决策过程的因素是政府层次上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两极和多极”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而其他的则是国家层次上的。

一、“人性恶”之说

一种传统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战争的存在是和人的本性分不开的。如汉斯·摩根索写道：“生存繁殖和主宰的动机存在于所有人身上。”^③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就认为，人类就本质而言是肮脏和堕落的。中国古代的不少思想家就持“人性恶”

① 肯尼思·沃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② Bruce M. Russett, *World Politics*, W. H. Freeman, New York, 1992.

③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Knopf, New York, 1967.

的观点，如荀子和韩非子。在西方也是如此，基督教就建立于人的“原罪”说之上。诸如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和 20 世纪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这样的宗教哲学家都将人视为万恶的根源。约翰·加尔文就言道：“甚至婴儿自己……也要遭到他们自身的罪孽的惩罚……因为尽管他们尚未产出他们的邪恶的果实，但他们身上已经具有了邪恶的种子。他们的整个本性……就是一颗罪恶的种子，因而只能是为上帝所厌恶的。”^① 在宗教领域之外，像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和霍布斯这样的许多哲学家也将人世间的苦难和痛苦归结为人性。在现代，战争基于人性的观点在道德哲学之外的空间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人物是奥地利的生态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他认为，人类之外的许多其他物种具有一种本能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攻击”本性。即便没有外界的刺激，有时它也会显现出来。而这也会表现在人类身上。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只能尽可能地通过积极的社会竞争来化解人类身上的攻击性能量。^② 后起的“社会生理学”的学者们也支持战争本性论。不过，和洛伦兹不同，他们不认为这种本性仅仅是生物学或基因意义上的。他们的观点是，人类的任何本性或行为习惯都和进化的过程密不可分，都是先天和后天的结合。今天之所以存在着对武力或战争的倾向，是因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暴力竞争促进了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从而使其借助人类本有的学习能力而得以强化并成为某种特征。^③ 弗洛伊德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认为，暴力和战争源于人类的精

① John Calvin, *On God and Man*. F. W. Strothmann, eds., Scribner, New York, 1956.

② Konrad Lorenz, *On Aggression*. Brace & World, Harcourt, 1966.

③ Edward O.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975.

神本质。^①

将战争和人性相联系的观点也遭到了不少质疑。比如说，它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若干文化或种族中几乎不存在战争现象？它如何解释和平时期在人类历史上远远不是昙花一现？它如何解释人类 90% 以上的死亡并非由个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所导致？因此，仅仅从人的本性来解释暴力，尤其是解释有组织的暴力现象——战争，是不够的，还需要去寻找普遍人性之外的其他原因。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著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对战争的人性论作了细致的评价。他指出：“毫无疑问，人性在导致战争方面是起作用的，但除了仅仅说明人性使人类有时打仗有时不打仗之外，人性本身是无法解释战争与和平的。”需要到人性之外去寻找其他原因，也有这样的原因。“如果人性是战争唯一的根源，……人性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和平就永远无望。如果人性只是战争根源中的一个，即便假设人性不变，我们依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和平的条件。”^② 沃尔兹还批评了主张通过改变人性来促进和平的设想。他认为，这种念头忽视了个人行为和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关系，而且，改变人性极其困难，不知要费多长时间，还有着各国能否一致行动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让人们挑选出心智健全的领导人。^③ 实际上，众多的将战争和人性联系起来的人士也并不认为人性是战争的唯一原因。他们的看法是人性造就了暴力趋向，而在一定的环境下，这种趋向就化为了现实。

① 对于有关人的本性和暴力冲突之间关系的理论的综述，参见：David P. Barash, *An Introduction to Peace Studies*. Wadsworth, Belmont, 1991, pp. 275—325.

② 肯尼思·沃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页。

③ 同上书，第45～56页。

二、经济帝国主义论

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或理论家将资本帝国主义列为国际战争的一个重要或主要原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认为，资本家通过剥削无产者而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政治现象（包括战争）的根源。不过，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的完整出现还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事情。首先做出系统论述的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霍布森认为，由于贫富分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不足之间的严重矛盾。于是，资本家尤其是金融资本家寻求将剩余产品或资本投向海外，以赚取利润，而这将导致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那些渴望从海外攫取利润的一部分人将操纵国家去进行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战争。^① 霍布森的理论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相当的影响，包括对提出了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的列宁。列宁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进行统治的阶段时，也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投资机会减少和平均利润率下降，产生了向海外输出资本，以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另外，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越高，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就越大。这样，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就具有强烈的殖民扩张的动机；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后起的国家向已攫取众多既得利益的老牌国家发出挑战。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国际现实。

不过，上述理论也遭到了诸多的批评，当然它们主要是来

^① John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1965.

自西方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将这些批评总结为：①霍布森和列宁将帝国主义的某种特定表现和它所表现的多方面的政治—社会学现象混淆了起来。帝国主义经济理论把国际政治僵硬地从属于国际经济，而与经济冲动相比较，政治冲动也许是更根本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是政府推着哄着资本家参加帝国主义事业。②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不能将帝国主义简化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历史上，为扩张而扩张，为打仗而打仗的例子屡见不鲜。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是非理性和无意识的，是社会文化的返祖现象，其经济根源是过去而非现在的生产关系。在现代世界，对外决策者并非总是代表着工商业资产阶级，而常常是前政权时期的贵族阶级。③尽管有人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军火制造商和其他可从战争中获取利润的人头上，但是资产者并非穷兵黩武之辈。只有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才能在有合理的预测和规划的情况下兴旺发达。因此，资产者不是战争的后台，而是和平的拥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平运动更加具有活力。④帝国主义理论认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具有扩张性和殖民意图的。可是，欧洲国家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殖民扩张并不如 16 至 18 世纪时广泛。按照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理应具有较少的殖民倾向，可是较落后的葡萄牙却是一个主要的殖民国家，而发达的瑞典和瑞士却未表现出丝毫的对海外冒险事业的兴趣。⑤实际上，资产者并未按照马克思的“铁的工资规律”行事，而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处于逐渐提高之中，国内购买力也有实际的增加。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也并非主要来自于垄断公司。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结构中，殖民地的重要性也并非那么巨大。在 20 世纪之初，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多数是流入了其他的工业发达国家，或是新兴的工业国家。征服了最多新领地的英国和法国正是经

济上最不需要这些土地的国家。⑥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许多战争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打的。因此，虽然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它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将决定人类活动的政治、心理和文化因素排斥在外。①

尽管存在着上述批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众多的现代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者（包括很多西方世界中的学者）认为，虽然殖民地地区在二战以后基本上获得了独立，但是，西方国家还是千方百计地谋求以间接手段对不发达地区进行政治控制，以使后者在经济上处于对它们的从属地位，继续作为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因此，不发达地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还是基本上依附于西方，或者说和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是“外围”和“中心”的关系。西方世界中的约翰·加同、托马斯·魏斯科普夫、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等和第三世界中的萨米尔·阿明、劳尔·普雷维什等学者都对这些方面作过系统的理论论述。与此不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毕竟促进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原料出口型经济和贫穷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第三世界的贫困和动荡的主要原因存在于这些国家的内部。

三、军国主义论

另一种将国内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某一阶层的经济需要和国际冲突联系起来的传统观点是，从事军火生产的资本家或军事工业部门会蓄意制造战争或国家间的紧张，以便通过扩大对军火的需求来获取利润。马克思主义者或左派人士常常将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253页。

军火业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认定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资本主义国家，谴责和军事工业相联系的战争贩子或是向人们警告其存在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一战结束之后，西方世界不少反思大战起因的人士都将军火商谴责为“死亡商人”，包括战争爆发之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而且，如许多人所认为的，军事工业部门和与其有着很多共同利益的军方以及若干科研和劳工组织等会形成“军事—工业综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国家政策发挥强大的影响。“军事—工业综合体”这一概念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961 年的卸任演说中首先提出的。他当时说道：“我们被迫创办长期性的大规模军备工业……在美国历史中，这种一个庞大的军事部门和一个庞大的军备工业的联合是前所未有的。其总体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可在每个城市每个州议会大厦每个联邦政府的办公室被感觉到……在政府部门中，我们必须防范军事—工业综合体获得不恰当的影响——不管它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种错误的权力得到灾难性上升的可能存在着并会持续下去。”^①“军事—工业综合体”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前苏联，军事工业部门和军方的联盟也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不过，关于“军事—工业综合体”和国际战争之间的关系，当今的主要观点是，通过支持军备竞赛和渲染国际紧张气氛，“军事—工业综合体”妨碍了裁军和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战争的可能，但它并不直接引发战争。为战争而作准备就能使它获得好处，而并不非要进行战争。

军事部门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基本组成。军方和军事工业部门的这种联合正反映了军方的“组织利益”（organiza-

^① Dwight D. Eisenhower, *Peace with Justice: Selected Address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1.

tional interest)。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官僚制的国家中，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有着自己“组织利益”，即每一个组织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财富、权力和威望。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是，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军方可能鼓吹甚至进行对外战争。史蒂芬·范·埃维拉指出，出于自己的组织利益，军方会有意无意地向社会宣扬一些“神话”，以求令他人相信，军方有理由得到更多的资源。以欧洲的历史为根据，他列出了五个曾由军事部门制造的主要“神话”。一是，军方夸大进攻相对于防御而言的威力和征服他国的轻易程度。二是，军方夸大他国的敌意，将邻国描绘为恶毒的和侵略性的。三是，军方夸大其他国家向威胁做出屈服的趋向，即它们面对武力威胁更可能退让而非以针尖对麦芒。四是，军方普遍地过分强调一个广阔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五是，军方经常低估战争的成本，有时甚至将战争说成是健康的或有益的。^① 不过，和很多学者的观点一样，埃维拉认为，与文官们相比，军官们并不会更轻易地做出进行战争的决定。在这方面，迄今最重要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是理查德·贝茨的《军人、政治家和冷战危机》。贝茨的结论是，在冷战期间，在是否发动战争的问题上，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和文官们一样谨慎，尽管前者在将战争升级的问题上更加强硬。^② 不过，并未得到否认的是，出于组织利益，军方也可能通过选择战争来凸显出自己的地位。在这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会促使军方这么做。

另外，在上述种种被制造出来的“神话”的笼罩下，一个

^①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MIT Press, Cambridge, 1993, pp. 204-206.

^② Richard K. Betts, *Soldiers, Statesmen and Cold War Cris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7.

社会可能更多地具有战争倾向，甚至弥漫着军国主义情绪，而军国主义正是一种促动国际战争的精神力量。谈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不能不论及德国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通常，军国主义者习惯于宣扬国家的“生存危机”或者是国际环境的严酷，强调军队对于国家的生存与稳定的重要和军人的崇高社会地位，推崇用武力手段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并主张全体国民对军事生活和对外战争予以积极的关注、参与和支持。军国主义可能和军方对组织利益的追求有关，但又不限于此。一个民族好勇斗狠的风气也可能源于其历史传统（比如哥萨克人和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①

四、地缘政治论

地理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相应地，地缘政治思想总是存在于对国际关系的思考中。不过，如果说存在着地缘政治学的话，这一名词的内涵并非那么单一。历史上知名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指出，地缘政治学有三种不同的含义：有人将其作为一种关于国家的侵略和扩张本性的学说；有人将其和政治地理学或行政地理学等同起来；还有人将其理解为根据地理因素来筹划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②

第一种与第三种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有着直接的联系。关于前者，最重要的是欧洲近现代史上以弗里德里希·拉采尔、鲁道夫·契伦和卡尔·豪斯浩佛为代表的思想。其基本观点是，生存于一定的地理空间之中的国家是一个类似

^① 参见：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Meridian, New York, 1967.

^②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于人那样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生存本性会激发各国进行扩张以扩大自己的领土疆界的欲望，强国的这种欲望最为强烈。豪斯浩佛的“生存空间”学说是这种认识的集大成者。^①这种地缘政治学说为国家间的战争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不过，将国家看做是争夺“生存空间”的扩张性有机体的这种理论显得十分粗率。与其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来评价它，不如仅仅将其视为有关国家的一种哲学理念。而且，在历史上，这种认识的最大影响倒不是令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国际冲突，而是为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工具，这典型地体现在了昔日德国的扩张思想上。实际上，豪斯浩佛的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德国的扩张拓展“生存空间”服务。

第三种意义上的地缘政治认识是今天的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在这方面，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最为人熟知。他认为，亚欧大陆上从东欧到蒙古的草原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历史上，控制这一地带的游牧民族利用可以在东西之间纵横驰骋的地理便利，给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今天控制着这一地区的俄国凭借其中所蕴藏的丰富资源和铁路带来的巨大机动性，拥有向大陆边缘地区扩张进而向海洋进军的潜力。因此，海上强国应该控制大陆边缘地区的桥头堡，以牵制陆上强国。^②在一战结束后不久，麦金德又进而指出，欧亚非大陆是一个世界岛，欧亚大陆的北部和内地则是心脏地区，而东欧是通向这一地带的唯一枢纽。因此，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区；谁统治了心脏地区，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

^①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4~76 页。

^②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

了全世界。^①后来的斯派克曼则认为，对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的控制更加重要，因为它是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缓冲地带，尤其是如果这些地区具有充分的工业力量和便利交通的话。^②

麦金德和斯派克曼的观点的差异可以表明，某种地理因素和一国的安全态势或战略选择并无一成不变的联系。更多的情形可以说明这点。如果一国是易守难攻的山地国家，那么，它究竟是因此而恃无恐地进行扩张，还是心安理得地满足于自保？如果一国国土狭小而又无险可守，那么，它究竟是选择扩大防御空间或先发制人的进攻性安全政策，还是委曲求全，苟且偷安？如果一国是像美国那样独居海外的国家，那么，它究竟是奉行孤立主义，还是积极地进行海外干预？可以理解，地理因素并非一国的安全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它们总是和个人、经济、社会和国际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于国家间行为。与此相关，虽然人们习惯于联系地理状况来认识一国的安全政策，但是，关于地理状况和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迄今并不存在一种全面的理论。

五、民族与文明冲突论

战争现象不仅和个体意义上的人性有关，也和群体意义上的精神价值相联。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简而言之，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共同的语言、血缘、历史和文化，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成员有着一致的相互认同感的人类群体，而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增进本民族的自主、财富、尊严、威望和文化生命力的希望，以及对这些方面的进

^①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orton, New York, 1962.

^②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务馆，1965年版。

步的骄傲。许多国家的国民完全或者主要属于一个民族。在这样的国家中，对民族的忠诚和对作为一个政治和地理概念的国家的忠诚基本上是同一的，而某种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弥漫于一国疆界之内的现象。

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对于本民族的热爱。但是，在现实中，通常与此相辅相成的是针对其他民族的对立情绪乃至敌意。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尼尔写道：“关于民族主义，我首先指的是这种习惯，即设想人类能够像昆虫那样被分为五色九等，而且各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的集团能够确切无疑地被贴上‘好’或‘坏’的标签。而其次——这点要重要得多——我指的是这种习惯，即使自己认同于某个民族或其他单位，以善恶之分来判断它，并认定除了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再无其他职责。”^①

相应地，通过造就各不相属的认同感，从而造就将人类分割开来的利益和精神鸿沟，分属各个民族群体的民族主义造就了世界舞台上的众多冲突。民族主义不仅仅表现为持续而又可在瞬间迸发而出的情感，它也可以以系统化的学说的面目出现，比如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论调。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使各个国家更投入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立、财富和威望。在极端的民族主义、超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的引诱下，某些国家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对于那些并非扩张性的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可能促使它们更易于诉诸武力，以解决与他国的纠纷。几乎任何一场战争的背后都可找到民族主义的动因。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也会引发一国疆界之内的分离主义情绪和种族对抗，从而导致许多国内甚至国际意义上的暴力冲突。

不过，不是任何国际争端中的民族主义都是自发而成的。正是由于民族主义具有强大感染力，统治阶层或某种势力可能

^① 转引自 Barash, *An Introduction to Peace Studies*.

会通过利用和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或者是煽动起民族主义为对外扩张服务，或者是将矛盾的焦点引向外部世界以求使自己从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或者是通过将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来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这些行为常常使民族主义“被动地”成为了国际冲突的中介。^①

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面对外来侵略，一国的人民和军队会显示出高昂的斗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也能起到抑制国家间战争的作用。^② 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的首要意义还是在于，它造就或加强了国家间或民族间的分歧、隔阂、猜忌和排斥，从而也埋下了侵略和扩张的种子。

不言自明，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对抗常常不可避免地和文化上的分立或差异相关。文化分歧可能导致不同的认同感和精神归属，也可能造成相抵触的行为方式和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误解。不过，萨缪尔·亨廷顿却将全球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分歧置于了极高地位。^③ 亨廷顿的“文化”即“文明”，它是“最高级的人类文化群体和人们所具有的最宽广的文化认同的层次”。在他看来，世界上存在着八大文明，而在冷战后的时代，世界政治中的最具根本性的冲突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文化上的对立是国家间冲突的主要根源。亨廷顿的这种论点为观察

① 参见 Jack Snyder, "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Post-Soviet State," in Michael E. Brown, eds.,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3; Stephe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 Spring 1994; V. P. Gagnon,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Winter 1994/1995.

② 参见 Carl Kaysen, "Is War Obsolete? A Review Essay," i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Cold War and After: Prospects for Peace*, MIT Press, Cambridge, 1993.

③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与主流认识不同的视角，当然其中的可争议之处也有很多。例如，英国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巴赞指出，亨廷顿将不少不是文明冲突意义上的国际争端都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而且将很多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搁置到了一边。另外，如果以文明为国际关系的根本行为体，那如何看待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①

六、国内矛盾的“转嫁”论

有时，一国对外进行战争或进行扩张并非出于或完全出于捍卫或夺取某种经济利益，而是因为该国的统治阶层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通过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与他国的冲突上，或通过寻求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实现淡化国内的政治矛盾、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谋求国内的政治团结等国内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对外矛盾只是国内矛盾的“替罪羊”。马基雅维里就曾对这种策略甚为推崇。在历史上，许多战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这样的原因，而 1982 年的阿根廷夺取英国控制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几乎完全出于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面对着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众对执政的加尔铁里军政权的专制的不满，阿根廷当局试图通过占领阿根廷人一直视为自己领土的马岛，来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

显然，不是任何国内危机都会导致对外战争。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国内冲突更可能引发“转嫁”式的对外侵略？不少研究正针对于此。比如，列奥·黑兹尔伍德分析了国内斗争的强度和对外冲突之间的关系，他假设，低烈度的国内冲突不会

^① Barry Buzan, “Civilizational Realpolitik as the New World Order?” *Survival* 39, Spring 1997.

诱发对外战争，因为尚不值得为它而冒战争风险；高烈度的国内冲突的存在则使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十分困难，因此也不会增加对外转移矛盾的可能。所以，中等烈度的国内冲突最有可能促成对外挑畔。^① 不过，量化研究并未证实这点。阿尔诺·迈尔指出，同属“精英”层的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 19 世纪欧洲很多国家间战争的一个缘由。贵族阶级在经济上需要资产阶级，因此它难以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也就只好利用对外战争来加强自己的国内地位。另一方面，在面临和国内一般大众的对抗时，贵族则更多地进行镇压。^②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若借此来考察今天的远为多元化的社会时，它却显得无能为力。库特·达塞尔将关于对外战争的“转嫁”理论和军方组织利益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在政治体制受到挑战时，军方愿意动用武力来保护和推进其利益；而当国内的政治分裂使对内使用武力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时，军方有强烈的对外动武的倾向。^③ 总而言之，要回答国内冲突如何被转嫁到国际冲突身上，更为细致的研究依然是需要的。杰克·勒维对“替罪羊”或“转嫁型”战争理论（scapegoat or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进行了一个较全面的评述。^④

① Leo Hazelwood, "Diversion Mechanisms and Encapsulation Processes: The Domestic Conflict-Foreign Conflict Hypothesis Reconsidered," in Patrick J. McGowan, eds., *Sag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Foreign Policy Studies*, Vol. 3, Sage, Beverly Hills, 1975.

② Arno Mayer, "Internal Crisis and War since 1870," in Charles Bertrand, eds., *Revolutionary Situation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Quebec, 1977.

③ Kurt Dassel, "Civilians, Soldiers, and Strife: Domestic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Aggres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Summer 1998.

④ Jack S. Levy, "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A Critique," in Mans I. Midlarsky, eds.,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Unwin Hyman, Boston, 1989.